

1 地区经济周期与地区调控

国内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多元化的经济周期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以一个国家或独立经济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归纳、推理，形成一般性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周期理论。但针对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地区，进行经济周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地区经济由于在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等方面的程度不同，各地区自身的特殊性越来越明显，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反周期调控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弱趋势。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需要加强，地区性的反周期调控体系需要建立。

1.1 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简要评价

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利·克莱尔·密契尔（Wesley Clair Mitchell）曾经给经济周期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周期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动重复出现。”^① 这一定义已被经济学界所接受，作为研究经济周期

的一般依据。西方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即经济活动扩张或向上的阶段；衰退，即由繁荣转为萧条，即经济活动收缩或向下的阶段；萧条，即经济活动达到收缩的最低状态；复苏，即由萧条转向繁荣的阶段。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就业指数、物价指数、收入指数等指标的变动来测定经济活动所处的周期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萌芽以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社会经济各个方面越来越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要求社会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特别是供给与消费，以及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做到按合理比例协调发展。进入 19 世纪以后，由于不断地出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衡而形成经济危机，从而出现了经济危机周期。19 世纪 20 年代，世界上爆发了一次明显的、波及面广、危害大的经济危机。从此就有较多的经济学家参与经济周期的研究。由于广泛地开展经济周期研究是在发生了对国民经济危害重大的经济危机以后，因而不少参与研究的专家声称，自己研究经济周期的重点是经济危机周期，表达了比较明确的研究目的。即：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成因，特别是经济危机周期的成因，掌握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规律，提出有效的对策，防止和减轻经济危机的危害。简而言之，经济周期研究的对象是国民经济的衰荣更迭，着重点是研究经济周期的成因，目的是提出使国民经济发展兴利除弊的对策。

在“二战”前，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周期成因及提出对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论点。他们提出的经济周期成因理论，可以概括地分为外因论和内因论两大类。主要包括：单一原因理论、实业周期理论、储蓄投资过程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一个理论又由若干学派组成。例如储蓄投资过程理论就包括前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而前凯恩斯主义又包括过度投资、消费不足、货币学派、非货币学派以及创新论。马克思指出，产生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

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存在着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政府主义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克服上述基本矛盾，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当然，马克思受其所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限，不可能提出通过资本主义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等办法来适度克服矛盾的论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入，1919年和1930年，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先后决定介入住房问题，成为资本主义政府局部地介入国民经济的开端。1936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第一次提出了政府要介入国民经济的学术论点。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总统决定领导美国政府比较全面地介入国民经济，推行旨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国民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从此，拉开了资本主义政府较大范围干预国民经济的序幕。

“二战”以后，各国政府吸纳了经济专家们研究经济周期成因的成果，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国民经济，实施了加强宏观调控，增强市场信息的准确、及时和透明性，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等方面的政策，从而遏制住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经济周期研究的重大成就和实际意义。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1912年所著《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论。说明只有在技术发明真正引入经济活动后才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创新，认为经济大规模扩张的原因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所提供的投资机会，并以此来说明现代工业化的市场导向经济中的不稳定性。熊彼特的论点属于成因论的一个学派，西方的专家把创新论归入储蓄投资过程理论，肯定了他研究周期成因的贡献。熊彼特在1939年所著《经济周期》一书中，用三位数计算出一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平均周期长度的专家命名经济周期，根据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把经济周期分为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康德拉耶夫周期（长周期）。随后的研究者又分出了具有特定涵义的熊彼特周期和库兹尼茨周

期。各种周期的划分有不同的依据，适用于不同的分析目的。在各种周期的划分中，时间较长的周期往往包含着若干个时间较短的周期，这就为周期分析提供了某种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基钦周期，又称存货周期、短周期。经济运动中存在的一种历时 3~4 年的有规律的经济周期波动。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Joseph Kitchin）于 1923 年在《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一文中提出，指物价、生产、就业人数等短期内的有规则波动，说明经济发展呈现景气和不景气的周期交替变动的短期趋势。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隔 40 个月出现一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也大致是 40 个月左右，一般认为是存货波动造成的。熊彼特在其经济周期的循环分析中沿用了这一概念，认为它与影响较小和实现期限较短的“创新”有关。克雷门斯（Jeroen. Kremers）对长、中、短周期关系的研究得出：一个长周期约包含 18 个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含 3 个短周期。短周期与长、中周期的重要区别在于，短周期的数目较多，平均持续时间较短，难以和某项特定的创新联系在一起，而很可能是一些适应性的波动。

朱格拉周期，又称投资周期、中周期，经济运动中存在一种历时约为 8~11 年的有规律的经济周期波动。是近代周期理论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lement. Juglar）在研究人口、婚姻、出生、死亡等统计资料时发现并提出的，他于 1862 年出版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性发生》一书，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证经济周期波动的著作。朱格拉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危机、清算三个阶段，并将这种交替现象称为“国家脉搏”。他强调价格水平的变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因为价格水平变动会引起货币、信贷和金融体系的混乱，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朱格拉认为，危机就好像疾病一样，存在于工商业发达的社会中，繁荣时期以危机来临而结束，衰退期则会孕育着新的繁荣期。这种定期的经济波动表现为一种有规则的趋势，故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这种规则的经济波动是自动发生的，并非偶然。他致力于金融波动

的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法、英、美三国金融资料，其中特别重要的资料有六种：物价、利率、贴现与透支、金属储存量、通货流量、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他认为，在周期波动中，以贴现与透支及金属储存量的波动为规则，表现为在票据及承兑票据利率上升和金属储存量减少之际，危机就迫在眉睫，危机之后，金属储存量就会增加，不久便会带来繁荣。这一周期性波动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种经济周期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主要课题。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之前，经济学家对朱格拉周期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消费不足周期理论、投资过度周期理论、纯货币因素周期理论、心理因素周期理论。凯恩斯经济学出现后，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基础上构造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如卡尔多周期模型、希克斯周期模型，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

库茨尼兹周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茨尼兹（Simon Smith Kuznets）在 20 世纪 30 年代根据一些经济发展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和价格变动的历史统计得出平均为 20 年左右的周期，二次大战后被称为“库茨尼兹周期”。^①

康德拉耶夫周期，又称趋势周期、长周期，经济中一种有规律的长期波动。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提出。这种由物价、生产、商业活动的多次波动所构成的长期经济周期，经历的时间约 50~60 年。康德拉耶夫所使用的资料主要取自英国和法国，并对这些数据序列进行了统计数字的加工，以消除 7~11 年的商业周期、短周期和可能的偶然波动。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着明显的长周期趋势。康德拉耶夫指出，长周期存在着以下五个特征：① 在高涨期间，繁荣年景居多；衰退阶段则萧条年景占多数。在长波的衰退阶段，农业面临着尤为严峻的形势。

胡寄窗著：《一八七〇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院》，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2 页。

衰退阶段涌现大量的创新（他称之为发明），但是在一个新高涨阶段到来之后，它们才能够被广泛应用。④ 黄金生产在高涨阶段之初有所增加，通常情况下，世界商品市场在新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同化下有所扩大。⑤ 高涨阶段将发生革命和战争。所有这些特征都内生于长波进程之中，并不是构成长波的外生原因。他认为，长周期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资本积累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技术的改变、战争的革命、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等，都不是一种外部的、偶然的、从而引起长期波动的因素；相反，这些因素本身就是长期波动的节奏的一部分，是长周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例如，生产技术的改变无疑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它意味着有关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已经完成；而且它们运用在经济上是可能的。但是，科学技术发明本身并不足以给生产技术带来真正的变化，只有采用它们的经济条件成熟，它们的大规模应用才是可能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到了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时期，即第一次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才得到广泛的应用。技术发展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其他因素，如战争与革命、新市场的开发、金矿的发现、黄金储备量的增加等，也都从属于长期波动的节奏，而不是从外部带来这种运动的一个任意的偶然因素。其后，熊彼特把康德拉耶夫周期作为他的经济周期之循环分析的一部分，认为一个长经济周期总与一些革新浪潮紧密相连。而这种革新浪潮常常具有确定的形式，并以此作为该经济周期的特性。他把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周期或三个长波，而且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① 18世纪70年代到1842年，即产业革命时代；② 1842~1897年，即蒸汽和钢铁时代；③ 1897年到20世纪40年代末，即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熊彼特认为，长周期的根源就在于影响较远，实现期限较长的“创新”。这种“创新”活动的长周期与康德拉耶夫周期是吻合的。对康德拉耶夫

长波进行实证分析，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在 1978 年指出，生产长波不能从英国、法国、西德和美国四个主要工业国家观察到，也不能从这些国家的加权数中观察到。1981 年，V. 尤杰克运用谱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生产中存在康德拉耶夫周期，本斯道克也于 1983 年利用谱分析检验了康德拉耶夫的有关资料，认为在价格和生产方面都不存在长周期。但在同一年，V. 杜伊金则证明了康德拉耶夫波动的事实，他发现尽管从一个国家的水平分析，长波的论据不足，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长周期。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的长期运行不连续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证明规则的康德拉耶夫周期不连续性的论据似乎是不充分的。1850~1973 年间，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与特定实践相联系的特殊意义的突变。人们注意到这一期间康德拉耶夫波动有时会消失。

熊彼特周期，是用“创新”来解释资本主义基本特性和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繁荣和衰退的交替，是由创新引起的；创新和继之而来的模仿促使经济繁荣；模仿和继之而来的盈利机会的消失促使经济衰退。资本主义由于不断创新产生了许多新要求，不可能靠私人组织来解决，便提供了用民主的方式通向社会主义的前景。熊彼特经济周期论的依据是他的创新理论，1912 年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对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认为，所谓“创新”包括五个方面：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方法）；开辟新市场（需求）；控制原材料的供应来源（供给）；实现企业新的组织管理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①。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敢于冒险、有眼光、有魄力，把新发明引入经济之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

胡寄窗著：《一八七〇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6 页。

者，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不断地实现创新，整个经济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实现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创新的，是一种“产业突变”，即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任何时候只要停止了创新活动，社会就没有生气，就会衰败。实行创新的企业家是社会的推动者。他们进行创新是因为创新能带来利润，资本则是企业家为了创新、实现新组合、把生产指向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资本的职能在于为资本家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利润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但企业家并不仅仅追求发财致富，他还追求利润以外的某种东西，如想做一番事业等，这种精神被称为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运用其创新理论对长周期作出解释。他首先假定存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在“创新”出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之中，利润为零。但是，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必然要进行“创新”活动，使生产要素的结合更为有利，从而获得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价值差额——利润。这些少数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的成功，必然使其他企业家争相效法，从而形成“创新”浪潮，技术革新成串出现。这就造成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的扩大需求，引起经济高涨。而当“创新”已经普遍地扩展到较多的企业时，盈利机会趋于消失，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收缩。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便出现“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由于“创新”活动不断出现，均衡再次被打破，又引起经济高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是，不同的“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各不相同，要求把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组织管理形式引入经济活动的时间长度也各不相同，这样势必出现多种周期。熊彼特认为，长周期的根源就在于影响较远、实现期限较长的“创新”。这种“创新”活动的长周期同康德拉耶夫周期是吻合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后来的长周期技术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门

施用现代统计方法验证和补充了熊彼特的理论，强调把需求和创新作为长波运动的引擎。

总结起来，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乘数和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投资影响收入和消费（乘数作用），反过来，收入和消费又影响投资（加速作用），两种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萎缩。② 创新理论。技术革新和发明有高潮和低潮，导致经济的上升和下降。③ 预期理论。公众对未来的预期看好或看坏导致经济的波动。④ 政治周期理论。政府周期更替，经济政策相应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许多国家提出了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尽量延长经济繁荣期，或者说尽可能地“熨平”经济周期。

由于“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危机已经熄灭，也就不必再研究经济周期的论点。有的专家则认为，目前个别国家个别年代仍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因而现在提经济危机熄灭似嫌过早，而以提经济危机得到了有效遏制为宜；同时还指出，“二战”后，虽然经济危机得到遏制，但经济周期波动的萧条或不景气阶段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危害。也正因为有危害的经济周期仍然存在，才需要继续深入开展经济周期研究。

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马克思主义传统教科书和经典理论影响，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所以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研究经济周期，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也才短短 20 年的时间，并且现在也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以及任何自由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制都不存在固定的经济周期”这样的观点，因

参见贺铿：《经济周期波动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经济规律》，《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此，中国经济周期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针对一个国家内的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更是没有被重视。

1.2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在中国还没有被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1)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立运行机制、相对特殊规律以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经济发展完全执行国家的计划安排，地区产业发展服从国家的计划布局，产品服从国家的计划调拨，地区之间只有产品调拨、没有商品交换，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地区之间有发展差异的存在，但这种差异主要不是市场因素造成的，而是计划安排和布局上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地区内的供给和需求没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没有研究地区经济周期的必要。存在的经济周期波动，也只能通过国家的计划安排来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地方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地方的产业发展虽然还受国家的控制，但控制力大大减弱，地区内的供需矛盾将主要通过市场规律进行调整，体现地区经济特殊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更加突出。由于中国对地区产业发展的计划调节是逐步退出的，地区产业发展中逐步强化的市场调节手段所产生的作用还没有被很好认识，所以对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以及反映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特殊性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程度等等地区发展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 认为经济周期是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经济周期运行也一样，要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需要制定最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不是各地一刀切的、笼统的政策，

因此需要加强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

(3) 认识到地区经济周期客观存在，但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不存在了，研究经济周期已经没有必要了，更没有必要再研究地区经济周期了。在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虽然会表现出与传统经济周期不同的特征和规律，但经济周期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根据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出现的新变化和可能出现的危害，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政府调节市场失灵部分，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地区经济周期也将表现出自身特殊性的一面，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加强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制定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国家调控和地方调控政策。

(4) 虽然认识到研究中国经济周期非常重要，但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起步晚，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只有形成了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才能指导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研究。地区经济周期问题应该同全国经济周期问题同步研究，地区经济周期理论和反周期调控实践也是构成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没有必要强调非得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才研究地区经济周期问题。西方国家众多的经济周期理论基本上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其研究分析方法可以“拿来”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也可以“拿来”运用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成果和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成果，也是全世界经济周期理论的一部分。

对经济周期研究的目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我认为，对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目的在于用周期分析研究的方法，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总量问题、结构问题、政策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等问题，探索地区经济周期成因，提出熨平经济周期、保持地区经济平稳运行的对策，说到底，也是使地区经济发展兴利除弊。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为此，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应是3000美元左右，达到世界银行2000年关于世界各国收入水平四类划分标准的中低收入国家水平（邱晓华，2002）。为达到这一目标，未来20年中国需要保持7.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胡鞍钢，2002）。这样的速度，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基本保持在连续的经济繁荣期。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2000年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平均值才4814元，折算为美元才582美元，要在202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未来20年西部地区需要保持9%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这样的速度只有超常规发展才能达到，必须使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在经济繁荣期。西部地区没有达到全面小康，中国就不能算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为此，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特殊性，经济增长与全国、与东部地区乃至中部地区都有明显的差异，西部地区的经济周期也与全国、与东部地区乃至中部地区有明显的差异，适用于全国的、东部的或是中部的反周期调节政策，并不都适用西部。因此，需要加强对西部经济的研究，加强对西部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调控政策的研究，更好地为国家决策服务，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研究西部经济周期及其相关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3 地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点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中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这个量在全国是分量，在地区是总量。根据我们对地区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地区经济周期具有以下几个一般特点：

首先，地区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地区经济运行中的波动和

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反映地区经济波动的地区经济周期也是客观存在的。地区经济由于经济基础、区位、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等要素的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中必然产生差异，经济运行也必然出现与全国不太一致的特殊规律，产生与全国经济运行的差异，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也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这些差异，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中观调控政策^①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作为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也基本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大势上的一致，全国反周期调控在地区经济周期波动中都会有体现。因此，对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不能割离与全国经济周期的关系，更离不开对全国经济周期的判断和评价，对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应该以全国经济周期为背景和参照系。

第三，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虽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在大势上与全国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但是地区经济周期往往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地区经济研究中，如果简单地通过全国经济周期的分析和研究制定地区经济政策，就会事倍功半；而应该通过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成因的研究分析来制定地区经济政策，把握省情、区情、市情，才最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经济是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也是国家政策的执行结果。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是从全国性的经济发展需要出发，考虑的是全国总量问题、全国结构问题、全国增长速度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都存在各地的特殊性，因此，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总存在着地方服从

目前的省级和区域经中经常出现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的说法，在本书中界定全国经济为宏观经济，国家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省级（区域）和部门经济是中观经济，省级调控是中观调控。

中央的情况，一条政策在某些地区往往是激发了生产要素加快配置，加速了地区经济增长，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还不能做到创造性地执行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对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往往成为重要因素。

第五，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受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各地区经济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下形成各具优势、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格局，各地区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调要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只有全国各地形成当地最具优势的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达到效率最大化。如果各地区都强调自己完备的产业体系，就必然出现为保护地区内没有优势的弱质产业而封锁市场，破坏市场经济体制，造成资源浪费，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发展速度减缓。因此，各地区之间影响经济周期波动最大的产业或产业群是不同的，也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全国的产业结构。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产业影响因素，重点要研究地区内主体产业的影响程度。

1.4 经济周期调控作用机制

（一）经济周期调控理论简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历了多次深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调控理论众多。中国 1998 年以来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从经济理论考察属于参考和借鉴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汉森（Alvin. Hansen）的汲水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时期，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诱导景气复苏，补偿私人投资的减少。汲水政策属于临时应急的短期财政政策，时滞短，效应快，经济萧条消失后不再使用。

二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补偿

政策，即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进行调节，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补偿政策适用于经济萧条和经济过热。

不论采取汲水政策还是补偿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公共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短期表现为需求效应，其长期表现为供给效应。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存在的通货紧缩态势，绝非单纯的生产能力超过市场容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微观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既有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导致了供给质量不高，造成结构性积压严重，反过来又增加了需求困境。这种态势不同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因此，单纯用凯恩斯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或供给学派的减税等一揽子供给管理政策，均不能达到调控效果。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导致供给状况不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者的需要，必须也只能通过供给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治理的办法在于把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压缩无效供给，实现结构升级换代。

以上两种经济周期调控方式都是“逆周期调节”，当经济运行接近或处于萧条期时，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各种政府控制手段和公开市场操作，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促进出口，以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或处于高潮期时，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政府控制手段和公开市场操作，抑制即期消费、压缩投资、增加进口，以抑制经济过热。这种调控方式目标是将经济控制在“中度”平均位势上平稳健康运行，可称为“平稳型”周期调控，国家经济周期调控通常采取这种方式。

从理论角度来讲，还存在另外两种不太常用的经济周期调控方式：“拉升型”周期调控和“压低型”周期调控。

“拉升型”周期调控类似于“顺周期调节”当经济运行接近或处于萧条期时，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也就是通过各种政府控制

手段和公开市场操作，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促进出口，以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或处于高潮期时，仍然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增长在“高度”平均位势上运行。这种方式从一个国家角度来说，由于会产生较大程度的结构失衡，不太适用，但适用于促进特定区域或特定产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种是“压低型”周期调控，操作方式与“拉升型”周期调控正好相反，保持经济增长在“低度”平均位势上运行。这种方式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为保护资源或其他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采用。

我国要在 2020 年建成全面的、殷实的小康社会，时间很短，对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来说，比较容易达到，但对于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来说，难度很大，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做到。为此，就需要我国在整体上实施“平稳型”周期调控的情况下，针对西部地区实施“拉升型”周期调控，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二）中国经济周期调控作用机制与阻碍因素

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周期调控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内容，高度重视。中国经过建国以来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积极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反周期调控体系，财政、货币、计划、物价、土地、税收、行政等一系列调控政策和手段日趋完善，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两大手段，物价和土地的调节作用也正在不断加强。

1.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财政政策是国家为调控经济运行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财政基本方针和准则，具体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预算政策等。在经济过热时财政可采用减支、增收的紧缩政策；在经济不景气时财政可采用增支、减税的扩张性政策。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

(2)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1998年以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是以抑制和治理通货膨胀为目标，调控手段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补充，财政政策的运用集中在税收的调节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加剧的矛盾，中国加大了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通过发行政府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新增国债建设资金加上银行配套贷款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急剧下降势头，使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13.9%的增长，使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投资大幅度增加。但在拉动加工工业和服务业投资增长和民间投资跟进以及刺激消费需求等方面，结果比预期的要低。1998年各项积极财政政策合计拉动经济增长2.36个百分点。

1999年的财政政策在强调继续发行长期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但更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以达到投资和消费双重拉动的目标。在全年增发的1100亿元国债中，500亿元安排了建设资金，600亿元安排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收入和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出口和酌情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所得税。政策的设计、运作、实施不仅有了明显的多重政策组合性，而且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体现出了较强